

波动中的农民

——对经典农民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宏生¹ 李利浩²

(1. 河海大学 科技处 江苏 南京 210098 ; 2.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在传统社会,农民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对自己的生活有基本的预期和掌握,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受到来自新技术、国家和市场等因素的冲击,身处一种波动的环境之中。市场使农民的收入和支出面临着风险,加之多变的国家政策带来的不稳定,农民的生活处于严重的波动中,并且由于农民缺乏控制这种波动的能力,而成为这种波动的被迫承受者。认识和理解当下农民的真实生活,从历史反观现实,是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 波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社会变迁;农民

中图分类号 :C9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4-0051-03

一般认为,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稳定,生活环境较少变化。虽然农民的生活在历史长河中难免会有变化,但总体上其生计模式相对稳定。然而,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内部与外在力量都造成了农民生活世界更为激烈的波动。可以说,波动中的农民是中国社会变迁的指示器。正因如此,回顾经典的农村研究,认识和理解当下农民的真实生活,从历史反观现实,是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重要视角。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江村经济》、《农民的终结》、《国家的视角》和《农民道义经济学》等农民研究的经典之作,力图展现现代农民的生活波动,以发现社会变迁与农民生活的真实逻辑,进而为后续的农民研究提供启示。

一、传统社会中的农民

中国的传统社会被费孝通描述为乡土社会,他认为传统乡土社会有两个重要的特性:稳定性和封闭性。“乡土社会的人是靠农业来谋生的,除了农业外不知道别的利用土地的方式,农民是粘在土地上的,而土地是不会流动的,世代定居是常态,人口流动很少,在观念上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因此流动的动力很小。”^{[1]37}另外,“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

膜。”^{[1]38}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由于水利、安全、家族继承等关系,中国的农民聚村而居。大体上来讲,乡土社会是具有地方性的,而在乡土社会内部则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由于人与人的相互熟悉,生活的时候面对的是同样的“熟人”,能够根据过去的经验采取行动。乡土社会的不流动和世代定居,以及人们的活动由于受地域的限制而导致村落的封闭性,不同村落的人们生活彼此隔离,使得村落本身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传统社会在生产方式上也是很少变化的,虽然也有改革,但是这种改革是非常缓慢和微小的。普通的农民成为革新者是非常困难的,耕作技术和方法的改进基本上是由贵族们进行的,因为他们有承担各种风险的能力。如果他们失败了,农民则不会尝试新技术和方法,如果成功了,新技术则会慢慢地被农民接受。但是普通农民在采用新技术和方法时仍然是小心翼翼的,有连续多年成功的经验才会去采纳,并逐渐并为“共同的经验”^{[2]39}成为农民传统的一部分。

这样稳定的社会存在着一系列使他们维护稳定社会的约定俗成的安排,这些安排构成了地方上相对稳定的道德系统,农民处在“地方道德世界”之中。在这个地方系统中,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生存风险和抵抗风险的能力。阶层之间的流动很少,基本上维持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一系列的道德经济安排

收稿日期 2009-07-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6CSH008);共青团中央 2008~2009 年度规划课题(2008GH107);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7420811)

作者简介 陆宏生(1971—),男,江苏海安人,助理研究员,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

使得在“正常情况下首先确保最弱者的生存”,村庄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稳固性^{[3] 35}。

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安排形成一种可预期的生活模式。农民采用过去几百年证明正确的生产技术,面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熟悉的人,在遇到灾害的时候能够得到“地方社会”的支持。这种历代沿袭下来的、能成功应付日常生活中各种情形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使得农民对周围的环境应对自如。虽然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风险,但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预知潜在的生存风险和危机,懂得“下一步该怎么做”,从而使他们得以相对平稳地生存下去。总之,如果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应对生活风险的惯常方式可以使他们平稳地生存下去,从而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生计模式。

二、现代社会变迁与农民生活的波动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各种外来因素对传统社会中相对稳定而简单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比如,新技术的引进、席卷一切的市场化以及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都对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与现代生产方式的碰撞,使农民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生活经验变地越发脆弱,他们的生活日益缺乏稳定性,风险增大。农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若从农民的视角来反观巨大的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用“波动”来指称农民生活所经历的“大转变”。波动作为一个“外在事物”,是指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模式的起伏不定,作为农民的内在感受,体现了农民对自己命运的无力感。

在费老笔下的江村,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蚕丝业是村里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在繁荣时期,这个地带的蚕丝不仅在中国的蚕丝出口额中占主要比重,而且还为临近的盛泽镇丝织工业的需要提供原料^{[4] 23},当地农民在经济上对他很依赖。但自从先进生产技术引进中国之后,乡村的家庭生产和传统的技术显现出较低的竞争力,日益衰落。个体家庭或当地育种者没有科学的控制和监控,会生产出受过感染的蚕种,使传染病毒广泛传播;习惯的方法不能使蚕的生长过程得到控制,因而大大降低蚕茧的产量和质量;旧型机器缂丝粗细不一,断丝率高。在这一情况下,出口量开始减少,蚕丝价格也在不断的下降,收入开始降低^{[4] 55}。杂交玉米产生的借贷和技术上的不确定以及市场的不稳定使法国农民处于一种与未来打赌的风险之中,还冲击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农民再也不能依靠对自己的土地的熟悉

来安排自己的活动,预测未来的生活,只有依赖于外来的技术人员和政府机构。”最后孟德拉斯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当地农民的境况:“突然间,农民感到自己投入到剧烈的、令人疲惫不堪的大潮里,他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能有所保留,而最终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市场的波动增加了东南亚农民收入的波动。“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地方的谷物供应量。而且相比以前,购买农具、租用耕畜和雇人插秧收割所需要的现金成本显著地提高了。^{[3] 76}

斯科特进一步在《国家的视角》对现代国家政权对农民生活的波动进行了精彩的阐述。国家机器试图把握现实总体的方方面面,将复杂的事实清晰化,并通过技术手段达到这样的目标。因此他们力图将各地多样的实践和度量单位整齐划一,“形成一个统一法律、身份证明、统计、规则和度量单位的透明社会^[5]”。特别是极端现代主义政府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为了政府的税收和清晰的管理,使得地方的多元化服从于中央的统一性,这加重了国民生活的风险。江村试图通过蚕丝业改革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但在外部条件改变并侵入农村的情况下,仍然出现很多的问题。“盈利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剩余的女劳动力浪费掉,并且延迟支付供给工厂的原料的全部价值。^{[4] 75}村庄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系统,按照国家设想仅仅通过改变蚕丝业的生产这样一个环节而忽视系统的其他方面的改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法国在推动技术变革——引进杂交玉米也面临类似的境况。杂交玉米是在美国培育成功的,但是杂交玉米在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高产量却不能使当地农民很快接受这样一个品种。新的杂交玉米使农民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中。杂交玉米需要购买种子,需要施放大量的肥料,更容易受气候和虫害的影响,需要喷洒农药,而且生长慢,需要细心呵护。在传统社会里,玉米并不仅仅是在市场上出售的无差别的粮食,它主要是用来饲养猪和家禽,人们很少出售。而杂交玉米在除了粮食方面以外的其他效用上大大降低,不能被当地人用来喂养鸡和猪。在现代国家政权的侵入下,地方社会和国家对东南亚农民的保护作用受到了冲击。乡村和家族分担风险的一系列安排被破坏了,乡村公共耕地不断减少直至消失,承担风险的物质基础不再存在。地主和农民之间那种保护性的、家长式的关系变成了不受感情影响的契约性关系。由于地主受到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及其本身遭受市场波动和天然风险的影响,具有比以往更大的权力。地主比以往提供更少的服务,不再给贫弱者提供社会安全保障。传统经

济中可以为农民度过饥荒提供帮助的生存性资源正在丧失。由于殖民地政府对地方森林资源、村有荒地和公共牧场使用的限制,农民不能在荒年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来渡过难关。殖民地政府为了稳定自己税收而牺牲农民的利益。特别是一些新的固定税的增加和征收力量的加强使得农民在灾年剩下的更少了,并且在灾年对农民的救助的作用不断减弱。这样使得农民开始孤立的应对生活的波动。

三、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思考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等著作中为我们展现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给当时的农民生计带来的冲击,无疑极具参考价值。斯科特、孟德拉斯等国外学者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也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然而,时过境迁,尤其是受全球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中国试图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这必然产生更大的波动,农民受到的影响更大。因而,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农民研究之后,有必要立足于当代的中国社会,认识和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必须承认,与过去相比,乡土社会那种不流动性或相对稳定性已经迅速地发生改变。国内很多区域农民的生计模式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比如,他们已经不再固守于传统的粮食生产之中,各种各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逐步扩大,市场化机制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模式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并且,在国家和市场的引导下,形成了很多的特色农业生产区域。在农业之外,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也对农村社会的变迁(比如农村城市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农民的流动性也大为增强,流动农民迂回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的生计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农村的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使得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农民和农民以及村庄之间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状况,以往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不断的弱化,这种波动都由单个的农民家庭甚至单个的农民来承担。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被深深的卷入市场之中,许多以前自给自足的物品变成由市场提供的商品。过去农民的生活用品大多通过自己家庭的生产得到满足,并且能够通过在不农时期的副业来弥补家用,但现在生产的粮食和其他的产品只有通过市场出售才能换取货币,而生活用品也要在市场用货币购买。这使农民的经营收入不再具

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波动使得他们的支出变得不再可控。“1985年农产品价格放开后,农业生产波动幅度明显增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落。^{[6][3]}市场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加之市场信息的缺乏和对市场规律的不了解,农民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另外农资产品的供给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单个的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的市场风险增大^[7]。

在转型期,现代化国家政权运作的‘显著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8]虽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是有限度的,但是这却使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波动。由于国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很多政策是为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而制定的,这使得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影响相结合。国家对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具有不确定性,且地方政府容易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来对待农民。在吴毅的《小镇喧嚣》中,农民在以前土地效益低的时候抛荒,但在国家惠农政策出台后开始争夺土地,其中一个农民代表说:“土地抛荒是不情愿的,同样为大形势所迫,国家的政策可以变化,我们要回土地总不会有错吧?兴国家变就不兴农民变?”^[9]可以说,农民总是“形势”变化的被动承受者。

在市场风险和多变的国家政策的双重影响之下,农民的生活正处在更大、更复杂波动之中。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3]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程立显,刘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4]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5]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02.
- [6] 邓万春.关于农民市场风险的一种表述:市场“规则”与“场所”的关系逻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43.
- [7] 王开化.后税费时期农民面临的风险问题分析[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9(4):276-277.
- [8] 于建嵘.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224.
- [9] 吴毅.小镇喧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23.